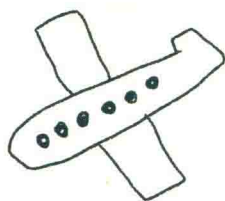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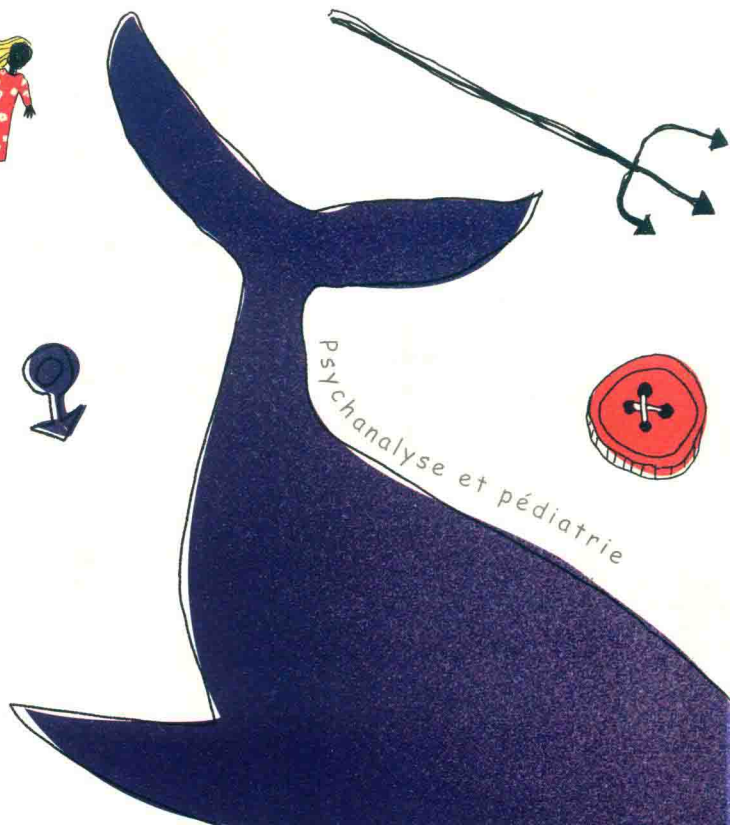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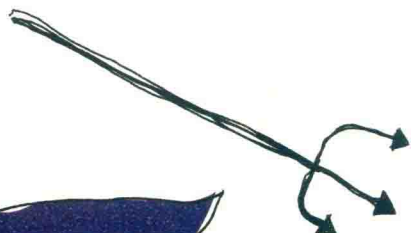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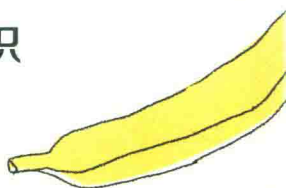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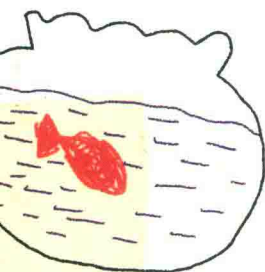
[法]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 著

彭仁郁 / 译



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父母应该知道的心理学知识



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父母应该知道的心理学知识

[法]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 著

彭仁郁 / 译



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父母应该知道的心理学知识

Haizi Zhen De Shengbingle Ma?

Fumu Yinggai Zhidao De Xinlixue Zhishi

出品人: 柳 漾

编辑总监: 周 英

项目主管: 冒海燕

责任编辑: 陈诗艺

助理编辑: 赵陈碑

责任校对: 郭琦波

装帧设计: 赵英凯

责任技编: 李春林

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

Copyright © 1971 by É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s du Seuil through Juan Wu.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16-1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孩子真的生病了吗? : 父母应该知道的心理学知识 /

(法)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著; 彭仁郁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6

(魔法象·阅读学园)

书名原文: Psychoanalysis and Pediatrics

ISBN 978-7-5598-0688-8

I. ①孩… II. ①弗…②彭… III. ①儿童心理学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267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00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虽然拙作必有疏漏，但我想将这本书以其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1]，希望能够帮助医生、父母、教育者了解精神分析与个体的智力及性格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性特质的演化在人类整体健康状态中如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30年来，精神分析研究使我们对本书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器质性、功能性或损伤性的生理障碍与性特质发展的交互干涉所引发的问题，令所有的医生都不得不去面对，进而促使某些医生致力成为身心疾病的专业医生。

自1939年以来，我们的社会处在急速的转变中。一方面，面对愈来愈多出现性格、学业障碍及其他各种不适应症的儿童，教育学开始研究更精进的教学方法和“补习”方案。设在各个地方的医学教育诊疗中心，为许多正因孩子的困扰而担忧不已的父母，提供了回应与协助。这些困扰包括口语表达、书写、阅读、运动机能、

[1] 本书最初为作者的医学博士论文，写于1939年。——译者注

就学、规则适应等方面的障碍。与此同时，城市的生活条件压缩了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年轻人的自我责任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再也无法、也不愿信任父母所说的话。家庭曾经是个人重要支柱与避难所，如今变得不过是个成长的过境之地，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个人的身体不再动辄受到各式疾病后遗症的侵袭，但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察觉到自己在情感、心灵上的无能为力，使自己永远处在可能失去心理平衡的危险中。每个人必须在现实情境中承担自己的性特质，而他却直觉地感知这个性特质即是自己焦虑的来源，他也必须承担自己的生育责任，因为他隐约感觉到这是他安心走向死亡的唯一“保证”。20 世纪的人类智慧不仅向寻求物质能源及其掌控之道开放，也向力比多（libido）的潜意识力量探出其触角。我们身负的责任感，因而有增无减。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1971 年于巴黎

译序

白袍女分析师——多尔多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

读者手上捧读的这本书，最早是在法语世界里名望和地位皆不下于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写于1939年的医学博士论文。20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又译心理分析）运动在法国方兴未艾^[1]，以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取得医学学位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即使算不得空前绝后，也堪称拓疆壮举^[2]。尤其是因为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法国普遍浸没在一股强烈的恐日耳曼情绪与反犹太情结中。

不畏人言的多尔多，积极而坚决地以精神分析师的身份，身披医生白袍为小病人看诊。法国当前多位杰出的儿童精神分析师，都

[1] 法国第一个精神分析学会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PP)成立于1926年。创立人之一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便是多尔多的个人分析师。

[2]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医学博士论文《论偏执型精神病与其人格之关系》(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写于1932年。

曾经直接或间接受过多尔多的训练和感召。

布尔乔亚身世、家庭神经症与“精神病核心”

1908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兹·玛黑特（Françoise Marette，多尔多 Dolto 是夫姓）在巴黎一个显贵而典型的布尔乔亚家庭中诞生。成人们之间的谈话老实地嵌在极右派的政治思想里，动辄显露保守僵硬的卫道者姿态。所幸，从童年起，弗朗索瓦兹即拥有极度敏锐的观察力及思辨能力，总是语出惊人，直指她所置身的布尔乔亚成人世界里人们早已浑然不觉的逻辑矛盾和思想窠臼。但澄澈犀利的童言童语，毕竟敌不过不耐烦的成人（尤其是母亲）的奚落嘲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把弗朗索瓦兹当成脑筋笃钝、不懂人情世故的孩子，对她外貌的评价也远不及对长她六岁的闺秀大姐。谁知，大姐在十八岁时却因骨癌过世，自此，这个美丽青春亡魂的阴影，便沉重地笼罩在妹妹身上。母亲在失魂落魄中哀号、嘶喊，为什么死去的不是弗朗索瓦兹？这位患有严重神经症的母亲，迫使青少年期的妹妹模仿死去的姐姐，但妹妹后来明白过来，这种想模仿逝者却永远无法与之嵌合的替身式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多年后，隔着这段时空回首顾盼，弗朗索瓦兹看到的自己，是一个与精神病间发擦肩而过的孩子。

除了自己的母亲，住在童年弗朗索瓦兹家公寓里，以及住在

公寓对面白医生的精神病院里的病人，都成了她敏锐眼瞳下的观察对象。八岁的弗朗索瓦兹立志要成为一位“教育医生”（médecin d'éducation），好医治那些不曾被了解的心灵。她这独创的认真念头，只换来大人的一句“这是什么玩意儿？从来都没听过”，如此便被草草打发。日后，当弗朗索瓦兹成为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分析师之后，她以专注、严谨的实践，为自己在童年绮思中创想的这门崭新行业，赋予了最完满的意义：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上，筑起理解沟通之桥。

多尔多的母亲，毕生准确依循布尔乔亚阶级赋予妇女的社会角色，先后辅佐父亲、丈夫打拼事业，管家育子，设宴迎宾，恪遵天主教教会的夫妻生活规范。纵有一身才能，也须从妇道，在社交场合淡化自己，安于次要地位。这便是弗朗索瓦兹自幼所接受的“教育”，那无非是为了将女人钳制在传统父系社会刻意为女性打造的命运和角色里。然而弗朗索瓦兹在校表现甚优，仗着师长的鼓励，加上父亲在背地里撑腰，她不顾母亲的激烈反对，越级参加高中会考，并顺利通过。在以优异成绩取得医护人员资格证之后，又苦苦熬过母亲多番情感要挟，二十二岁的多尔多终于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一起进入医学院就读，专攻儿科学。

同一时期，多尔多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倡导人拉福格相遇，并从1934年开始接受为期三年的个人分析。但一直到她的个人分析结束前，她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理论的认识，仍停留在高中哲学

课上老师对弗洛伊德的简要描述而已^[1]。无论如何,这段分析经历,使得多尔多聚集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坚决而不带罪恶感地一刀斩断受母亲情绪牵动的感情脐带。后来,多尔多也在诊疗中运用这个“拉福格技巧”,以协助个体脱离家庭神经症(*la névrose familiale*),因为这是唯一遏止父母陷入其神经症心理机制,并保护个体免于侵袭的方法。将儿童视为完整主体的多尔多认为,教育者的责任之一在于告诉儿童,他并不是矮成人一截的劣等存在,而报答父母最好的办法是在万一受到父母伤害时拒绝扮演被动者的“共犯角色”。儿童应扛起自己的责任,走出自己的路。

卷入精神分析运动纷争:是巫师,还是分析师?

进入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PP)后,多尔多结识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第一代、第二代的多位领袖人物,其中与拉康的相会迸发出最绚丽的智慧火花。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数十年,各自以迥异的独特风格传承、拓展弗洛伊德所开辟出的潜意识知识矿脉。然而两人的特立独行,并未受到自认为承袭弗洛伊德正统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IPA)成员的赞同。1953年,SPP内部发生派系之争,多尔多和拉康等人追随

[1]在分析运动开展之初,曾经严格规定正在接受分析的人不得阅读任何与精神分析理论有关的书籍。

拉加什^[1]，另创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简称 SFP），广为拔擢所谓的“世俗分析师”^[2]。但在 1964 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再次否决 SFP 的入会申请，点名拉康和多尔多，强烈质疑二人的临床实践，断定他们不适任传授弗氏学说之职，就连豁然如温尼科特（D.W. Winnicott）也不例外地将二人视为蛊惑人心的教派领袖。受罢黜的二人，离开后携手创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简称 EFP），然而后者渐行壮大之后，仍不能幸免于阅墙之争。拉康本人于 1980 年宣布解散学派。次年，大师辞世，众子弟纷纷四散另组据点，至今全法已有二十几个分析协会。

在自诩为正统学派的分析师的眼里，多尔多对儿童所做的分析式心理治疗，滥用个人魅力，尤其是她聆听婴儿，试图与婴儿“对话”的举措，更加激起同时代多位分析师的异样眼光与猛烈抨击，他们甚至把多尔多当作从非洲不知哪个荒僻的丛林里冒出来的女巫师！

卫道者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分析师都拥有一颗经苦痛过往沉淀、宁息而不致爆发的“精神病核心”（noyau psychotique），不是所有的分析师都能放下身段，去学习儿童的语法

[1] 拉加什（Daniel Lagache），法国第二代精神分析大师，先后于 1953 年及 1964 年创立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FP）和法兰西精神分析协会（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APF），是法国首位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大学，成立专业院系而受到法国大学体系正式认可的重要人物。附带一提，他曾是萨特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窗。

[2] “世俗分析师”（analyste profane），在此，“世俗”之于“宗教”，指的是非精神科医生相对于精神科医生而言。但在拉加什所创建的分析训练体系之下，受惠的大多是临床精神分析师。

和非口语表达，去置身儿童滞留的心理情感地带，因为儿童正用仅有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心灵苦痛，而分析师必须设法学会聆听这特殊的言语，才有机会引领儿童走出陷身之地。

追随弗洛伊德，开拓儿童精神分析

《孩子真的生病了吗？》里的十多个临床案例描述，见证了这位刚踏入精神分析学界的儿科医生所拥有的高度洞察力、直觉与热忱。读者可在字里行间体会到多尔多不顾同行的质疑目光，大胆对儿童（甚至是婴儿）做分析式治疗，并且跨越语言（分析师所惯用的分析材料与工具），通过绘画、黏土、娃娃等极富创造力的手法探入儿童的潜意识。事实上，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弗洛伊德学派信徒。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精神分析学家，能以如此清晰、简明的语言，说明弗氏念兹在兹的性心理演化阶段、人格结构、幼儿性欲、俄狄浦斯情结及与之相关的阉割情结等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进而辅以多样的临床案例，证明弗氏理论的真实性及精神分析在临床治疗上的效用。当然，明晰阐述不循理性逻辑而行的潜意识运作，难免要冒将繁复交错、混沌晦涩的潜意识图像简化、样板化的危险。为了不陷入逻辑概念的僵局，分析师必须有胆量承认自己不懂，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和理论的辩证之间弄懂些什么。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从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潜

伏期一直到生殖期)的理论建构深受达尔文进化观点的影响,随着个体生理发展的成熟,作为性本能冲动(生命冲动)动力来源的力比多会被投注到各个不同的情欲区(zones érotiques)。每个阶段的残留痕迹不一定会造成心理疾病,唯有当针对某个过时情欲区的病态固着(fixation)造成力比多的阻滞,令主体无法将主要的力比多投注到当前发展阶段的情欲区时,才会发生所谓的心理病态行为。

理论上讲,俄狄浦斯期发生时间约与阳具期相符。按照多尔多的观察,这个时期在三岁至七岁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阶段式的研究思考模式,都只能作为临床工作者辅佐分析的参考架构工具,而不能直接被拿来当作评判正常或异常的绝对标准。因为,即使是在“正常”主体身上,这些在逻辑思考中被硬生生区分开来的阶段,都可能随着不同的主体在不同年龄发生过渡,并且所谓过时阶段的力比多投注形态也可能以较弱的比例与现行阶段并存。)弗洛伊德之所以不区分性别地称之为阳具阶段,是因为他认为不论对男孩还是对女孩而言,这个阶段的力比多投注皆以阳具情欲满足为目的。对于弗氏的阳具钦羡,多尔多是如此解读的:在儿童的想象中,阳具被高举为力量的象征物,不仅是爸爸拥有阳具,就连身为成人的妈妈也应该有,只是或许比爸爸的稍微小一点儿。而当母亲向受阉割焦虑折磨的孩子承认自己从来不拥有阳具的那一刻起,她便从原本占据的母神高位跌落到凡间。

初识男女在生理构造上的差异,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应在位的某物(阳具)的缺席,被迫面对一个因无法理解而涌生无限恐惧感的

缺憾，可能对原本处在中性范畴的儿童造成心灵创伤。多尔多在本书里反复解释的阉割情结，指的便是感官的撞击（目睹阳具的不在）在意识层次引发的恐惧感——因为主体有意识地感受到自己拥有的珍贵物正面临着失去的威胁——通过主体“内摄”（外在的规范、惩罚、律法）与“投射”（自身内在的攻击性、敌意）的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潜意识中超我与本我的僵持对抗局面，以确保对可能的威胁维持警觉性，这时，主体的力比多因此将无法被使用于情欲需求的基本满足。甚至，它可能会反过来对抗自己，令主体做出自我毁伤的行为。真正的心理创伤就是借着这个内化过程发生于潜意识层次的。

阳具中心的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论述

清教徒的性解放≠传统性别角色的性别解放

看过电影《布尔乔亚阶级的拘谨魅力》^[1]的人应该能体会，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之前，一个女性在公开场合大谈阳具、力比多、幼儿性欲、俄狄浦斯情结，会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行为。然而，在21世纪初阅读本书，不禁要对作为儿童自慰性解放者的多尔多竟无法脱离传统性别角色的保守框架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在

[1]《布尔乔亚阶级的拘谨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 1972），超写实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的作品。

性事上如此“另类”的多尔多，居然在性别议题上颂扬令人恐怖的传统性别角色典型。比方说，多尔多在本书中谈到所谓“正常”的家庭时，指的是“父亲做主而父母亲相亲相爱”的家庭，男孩长大了以后要像爸爸，女孩则像妈妈；而谈到男女由于解剖学上性的差异而造成社会行为反应上的差异时，则说男生天生主动、具攻击性，女生天生较被动、善等待……简而言之，两性差异便被简化为下列等式：

男孩 = 阳具 = 拥有力量、地位 → 强化阳刚认同

女孩 = 缺乏阳具 = 缺乏力量、地位 → 寻求阴柔认同（借着吸引阳具拥有者而取得权力）

这种对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建构层面避而不谈的生物学论述，或许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描写了昔日（甚至是当前）的两性真实社会处境，但个中危险在于，当这样的描述企图以性生理差异作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唯一理论基础，并以此为两性性别发展的常态时，我们便只能再次落入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窠臼，永远不得翻身。如此一来，性别的生理结构便决定了心理性别的发展，也决定了男性与女性个体的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正常）模式，而任何个体的变异都可被当成解释心理病理症状（神经症、精神病，甚至是同性恋）的病源学基础^[1]。

[1] 参考弗洛伊德写于1925年的文章《解剖学上之性别差异对心灵带来的几种后果》（*Quelques conséquences psychiques de la différence anatomique entre les sexes*），法文版收录在《性生活》（*La vie sexuelle*, Paris, PUF, 1969）中。

此外，在多尔多所描绘的刻板的两性关系中，虽然男女皆为主体，但前者为主动主体，后者为被动主体。此观点无非是继承了西欧自中古世纪以来的骑士淑女爱情模式（l'amour courtois），这势必要让苦苦奋战多年的女性主义者啼笑皆非，甚至嗤之以鼻了！然而，多尔多却忘了自己是第一个违背这个性别等式的女性。显然，布尔乔亚社会传统教义的遗物并未全然在这个女思想家的意识底层褪除。暂时撇开她的生物论观点不说，从她笔下浮现出的社会景象，似乎从未质疑性别分工的正当性。毕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社会直到今天，带孩子到医院就诊的几乎清一色是母亲。在法国，20世纪60年代才第一次听到波伏娃的声音，而且在当今的法国，女性主义者早已成为凶煞丑女的同义词，大多数女性避之唯恐不及，不愿沾上一点儿关系。两性平权的呼声在远未抵达终点之前，便已颓然失其后劲。如此说来，这种在当前显得十分“不合时宜”的旧时代性别差异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检视今日两性关系是否获得改善的映照。

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已不能再以异性恋作为正常参考框架，也无法执着于性别决定论，否则，这会让精神分析理论背上正当化和强化男性主宰社会结构的罪名^[1]。如今，那些硕果仅存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所关心的大概是，性与性别差异的等式什么时候可变成：

[1] 参见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爱之束缚：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与支配问题》（*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8）。

阴蒂 = 拥有力量、地位

其目的不是为了激进地将阳具钦羡彻底翻转成阴蒂、阴道或乳房钦羡,以后者取代前者,而是探问是否存在多样自恋^[1]或钦羡形式的可能。特别是现在的精神分析学家,在面对同志及酷儿理论的冲击与挑战时,确实应该省思如何跳脱前一代受制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在变迁的社会中思考性别与心灵结构发展的复数关系。

法国的克莱恩?

就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时间表而言,多伦多并不是最先开始拓展儿童精神分析的人。开创儿童精神分析的是借着深化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 theory)拓展弗氏学说,进而赋予其新生命的梅兰妮·克莱恩^[2]。虽说多伦多在法国首度将精神分析之理论及疗法运

[1] 简而言之,在精神分析词汇中,自恋(narcissisme)指的是主体确认自己具有存在价值、值得被爱的完整感受,这种感受会反映在主体对自身的潜意识意象中。

[2] 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 1882 ~ 1960),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波兰犹太裔家庭,后移居布达佩斯,曾先后接受桑多·费兰齐(Sandor Ferenczi)与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分析及训练。1919年成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1926年在恩尼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邀请下移居伦敦,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开设讲座,并成为其正式会员。弗洛伊德学说之所以能在英国深植,克莱恩的贡献巨大,温尼科特(DW. Winnicott)、拜昂(WR. Bion)等多位杰出英国分析师即出自其师门。从1941年起,克莱恩与继承父业的安娜·弗洛伊德因二者对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的分歧,展开逾十年的世纪大辩论。

用于儿童、精神病患者等传统弗洛伊德派分析学家认为无法分析的对象^[1]时,并未阅读过任何克莱恩的著作,但她和克莱恩有着相同的直觉,认为主体的形成,不仅仰赖以阳具作为符号的父性象征秩序的建立,个体与原初客体(通常是母亲)在前俄狄浦斯期的互动模式,更是奠定主体日后心理情感发展的基础。因此,分析运动中的这两位女性大师不约而同地提出,精神病的病源与幼儿最早期与客体(母亲或哺育者)或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联,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因而分析式治疗便应以客体关系的观察与修补作为着眼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1949年,除了画画和捏黏土,多尔多又发明了布娃娃作为辅佐治疗的工具。借着提供有精神病症状的孩子一个可以任他投射其负面情感却不具威胁性的客体,这位分析师便塑造了一个允许话语自由流动的空间,换句话说,也就是使新客体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的过渡空间(transitional space)。这就使多尔多的理论与温尼科特的“过渡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概念接壤。

但当个体心理发展理论的中心从父性移至母性时,可能衍生出的问题是,一旦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任何心理问题,母亲便成为众矢之的。最显著的情形是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1]此论点的基础是,这些个体的超我尚未构建完全。拉康也曾提出在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中成长的个体是无法分析的(inanalysable),理由是这些个体缺乏主体性。然而,拉康的这个结论纯粹是从对日本语言结构的表面观察而来(日语中,以“我”作为主语的语句,在多数情况,“我”都被省略),而忽略了“我”的位置必须放在潜在句子结构中来理解。